

在中國因素下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歧與整合： 2003 至 2016 年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隨著中國政經實力的崛起對全球各地產生了程度不一的影響，而位處中國邊緣的台灣和香港更是由於歷史發展與地緣政治的糾葛，有著更為深刻而全面性的影響。在台港兩地與中國日益密切的交流互動中，一個令人感到有趣且弔詭的現象就是，當中國愈想透過各種手段與方式來促進兩岸三地的統一或融合時，台港兩地的人心卻離中國愈來愈遠，中國因素的作用力似乎持續推進台港兩地社會本土意識的高漲。在當前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中，除了凸顯出與中國官方民族主義的對立之外，另一個複雜與特殊的面向在於，隨著政治形勢的轉變，在本土意識的內容上出現了分歧乃至於衝突。在本文的分析中劃分出三種主要的本土意識類型：民主回歸論、民主自決論、民族自決論。它們也分別對應了三種不同的抗爭模式：和理非非、公民抗命、勇武抗爭。不同立場的行動者與團體基於情感、利益、認知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本土論述內容，進而採取了不同的抗爭策略與行動，而這些分歧也使得香港的民主運動面臨整合與團結的難題。

關鍵詞：本土意識、中國因素、民主、民族、香港

台灣社會學第 38 期（2019 年 12 月），頁 115-161。DOI: 10.6676/TS.201912_(38).04

收稿：2018 年 10 月 26 日；接受：2019 年 11 月 5 日。

* 通訊地址：26247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Email: tbcheng@mail.fgu.edu.tw

The Di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of Local/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in Hong Kong under the China Factor: From 2003 to 2016

Tsu-bang Ch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Fo Guang University

With the growth of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China has been impacting the world differently. Located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have complicated connections with China in both geopolitics and history. In this paper, we observe many social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mong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and paradoxical phenomenon: The more closely these areas are integrated, the greater is the local/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With the framework of the China factor's action and reaction, we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in Hong Kong. In addition to confron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re has been a complex and uniqu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local/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cleavages and conflicts, along with the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analysis, we propose three types of local/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democratic reunification, democratic self-determinati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hese three types also correspond to three modes of contention: peaceful, rational and non-violence, and no foul language/ civil disobedience/ brave fight. Different types of local/indigenous discourses have their own supporters regarding different affections, interests, and ideologies. Different supporters also employ different resistance strategies based on their discourses. Furthermore, these cleavages bring about integration problems in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Keywords: local/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China factor, democracy, nation, Hong Kong

一、前言

近年來，在許多的媒體報導、學術研究乃至於社會運動場合中已經有愈來愈多關於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的相關討論，特別是中國因素對台灣和香港兩地本土社會的影響更是焦點之一（王耀宗、陳冠匡 2017；方志恆 2017；孔誥烽 2011；吳介民 2014a；2014b；何明修 2017；Ho 2019；Kwong 2016b；Ma 2017；Yuen 2014）。事實上，隨著中國政經實力的崛起及不斷增強，也對全球各地產生了程度不一的影響，中國因素可以說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不過，大多數國家往往是在經濟面向上受到中國因素較多直接的影響，相對而言，位於中國邊緣且同為華人社會的台灣和香港，其所受到中國因素的影響，則不僅僅是在經濟面向上，更包含政治、歷史、文化乃至於意識形態的各種面向。此外，台港兩地基於歷史與地緣政治的不同，台灣相對而言較有能力與中國在主權問題上進行對峙與抗衡，而香港從英國手上移交回中國之後卻必須直接受到北京統治權力的干涉與支配（Cheng 2016: 387；Fong 2013），因而中國因素對香港在地社會也產生了更為深刻而明顯的影響。就此而言，香港在相關中國因素議題上的經驗，也許可以提供台灣某種程度的借鏡與反思作用。就本文關心的重點來看，隨著台港兩地與中國的交流互動日益頻繁密切，環繞著中國因素所形成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也會不斷浮現，而其中一個令筆者感到興趣的現象就是，當中國愈想透過各種手段與方式（無論是威逼或利誘）來促進兩岸三地的統一或融合時，台港兩地的人心卻似乎離中國愈來愈遠，更弔詭的是，中國因素的作用力似乎促使了台港兩地社會本土意識的高漲。

國立政治大學的選舉研究中心與香港大學的民意網站（HKU POP SITE）都長期關注台港兩地民眾的政治身分認同問題，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對比調查就是「台灣人 vs. 中國人」和「香港人 vs.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變化。姑且先不論統計資料中存在著許多值得討論

的細節，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發現到，中國在過去二十餘年崛起的過程中，儘管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卻吸引不了多少台灣人和香港人的目光，反而不斷加強了他們自身的政治身分認同，並且在 2014 年同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台灣人的認同 60.6%、自稱香港人 42.3%），當年兩地分別發生了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值得注意的是，純就數據上看，到目前為止台灣人身分認同的高點不是發生在力倡台獨的陳水扁總統任內，而是在加強兩岸開放的馬英九總統任內，兩岸更緊密的交流似乎是強化而不是改變以台灣人作為身分認同的長期趨勢。香港到了 2010 年開始（自稱香港人 35.5% / 自稱中國人 21.1%）一直到 2014 年底，「自稱香港人」（42.3%）的比例開始明顯地超過了「自稱中國人」（17.8%）的比例，北京政府拒絕真普選導致雨傘運動的爆發明顯地提升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¹

儘管台港兩地在身分認同的量化數據上有著相似的軌跡，不過，如果進一步深究相關的經驗現象，我們會發現到香港近年本土意識的生成與發展背後有著許多的複雜性與特殊性。基本上，香港傳統的政治對立是建立在親中的「建制派」（pro-Beijing）與抗中的「泛民主派」（pro-democracy）之間（台灣則是藍綠對立）。不過，近年來民主運動陣營開始在論述內容與行動路線上發生了矛盾與衝突，特別是在 2014 年雨傘運動過後一種原先隱伏在抗爭行動背後的分歧爆發了出來，不同立場的行動者與團體基於情感、利益、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本土論述（local discourses）內容。在本文的分析中，筆者嘗試建立若干本土意識的類型來作為一種分析架構，從而理解並說明香港本土意識中多重的發展系譜。此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在中國因素的作用力與反作用的結構中，不同的本土意識的論述或認知框架（framework）對相關行動者與團體在抗爭的策略與行動上產生

1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網站（<https://www.hk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index.html>）。此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的統計資料也呈現出相同的趨勢，可參閱吳介民、廖美（2015: 146）的討論。

不同的作用與影響，並且也會形成不同的競合關係。總體而言，筆者希望從這些面向來對近年香港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進程進行具體的分析。

二、文獻回顧

（一）中國因素的「反作用力」

近年來，「中國因素」一詞在大眾媒體或社運場合經常被大量使用，但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而被提起，則導源自吳介民在 2014 年的一篇文章中的界定：「中國政府運用資本與其他相關手段，對他國或境外區域從事經濟吸納，使其在經濟上依賴中國，進而執行其政治目標，這個作用力機制就是『中國因素』」（吳介民 2014b: 135-136）。基本上，藉由中國因素這個概念就是想要去理解中國如何運用經濟手段（各種讓利、措施）來達成其政治上直接或間接的控制。在 2017 年，美國學者 Christopher Walker 和 Jessica Ludwig（2017）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提出一個意義相近且受到廣泛討論的概念——「銳實力」（sharp power）——來指涉中國、俄國等威權國家如何透過媒體、教育、文化等相關機制試圖形塑與操控歐美國家的公眾意見。與此同時，台灣出版了《吊燈裡的巨蟒》一書，透過集體創作的方式，不同研究者從經濟投資、陸客旅遊、教科書爭議、媒體與網路、宗教文化交流等呈現出中國因素在不同面向皆對台灣產生影響。主編之一吳介民（2017: 15-16）在第一章的討論中具體提出了中國因素的「作用力」（action）與「反作用力」（reaction），來作為全書最重要的分析架構。筆者認為這是對 2014 年中國因素概念更進一步的細緻化，除了過去以「在地協力機制」來觀察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在本書中進一步提出「作用力／反作用力」這個觀察架構，而所謂「反作用力」就是指在地社會對中國干預的抵抗，而這樣的抵抗反過來也會進一步影響到中國因素在作用力上的進步和演化。

對中國因素的「反作用力」可以直接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表現出

來，例如：在台灣所發生的反媒體壟斷運動（2012 年）、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2014 年）、高中生反課綱運動（2015 年）等，在香港像是反高鐵運動（2010 年）、反國教運動（2012 年）、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2014 年）等。不過，這些反作用力的形成和運作還涉及到相關行動者如何「認知」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反作用力的發生並非是對作用力一種直接或機械式的反應，如同吳介民（2017: 62）所強調這需要有一個「社會過程」，就是認知社群（知識圈、媒體專業、公民運動者等）要對作用力有所覺知，凝聚共識，形成論述，進而採取集體行動。事實上，這樣的構想在《吊燈裡的巨蟒》這部集體創作中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與討論，該書的討論主要是以作用力背後的協力網絡作為研究焦點，因此，透過對反作用力認知的研究將可以讓我們更細緻地觀察在台港兩地因中國因素所引起的社會內部的分歧與爭議，而筆者認為當前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歧化現象正好可以提供我們一個適當的研究案例。它可以讓我們觀察到面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不同的行動者與團體卻形成了不同的「認知」，乃至於發展不同的論述內容，進而影響到具體的抗爭策略與運動形式。

（二）香港本土意識概念的界定與釐清

從文獻回顧中可以發現到，在回歸之後對香港本土意識（local/indigenous consciousness）² 的相關研究隨著中港互動形勢的變化相關主題也有所改變。在回歸初期多以「認同研究」（identity research）

2 從接下來的文獻回顧中，讀者可以發現到大多數學者討論相關議題時，幾乎都是使用 localism 或以 localist 來指稱本土派。不過，由於英文 local 一詞的內涵是對立於 national 或有中央／地方相對之意，而當前某些香港本土意識的內容已經不純粹是 local（地方）了，似乎使用 indigenous 也是可行的方式。基本上，香港的「本土意識」從一種地方意識發展到民族意識的過程，並且，在當下無論是 local 或 national 的本土意識都是同時存在香港社會中。例如：民主回歸論就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追求民主改革而不去挑戰中國的主權，民主自決論則是強調由香港人民通過民主程序共同決定未來的方向，民族自決論就試圖挑戰了中國的主權強調香港民族的建構來完成民主的目標。所以，從這樣的經驗現象來看，無論用 local 或 indigenous 任何一個英文字都很難完整表達香港「本土意識」的動態內涵。筆者在本文的作法就是以 local/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來兼顧 local 和 indigenous，希望來引導出一種更為廣泛的理解方式。

作為主題 (Brewer 1999; Chan 2000; Bhattacharya 2005; Yew and Kwong 2014)，一直到了雨傘運動和旺角衝突發生之後，「本土主義」(localism)的主題才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相關研究中(陳健民、吳木欣 2017; Kwong 2016a; 2016b; Veg 2017; Wong 2017; Lam 2018)，而「香港民族主義」也成為一種討論方式 (So 2016; Wu 2016; Fong 2017; Cooper 2018)。在香港回歸之初，許多研究者已經開始注意到「香港認同」(Hong Kong identity)與中國「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衝突 (Brewer 1999: 191; Ma 2007: 154)，而當時所謂的香港認同涉及到一套在英國殖民時期逐漸在香港人意識中建立起來共享的價值和態度，它包含了先進的資本主義體系、有效的行政與法律制度，以及一整套社會生活方式與流行文化，這也讓「香港人」(Hongkongers)成為一種自我認同的符號 (Brewer 1999: 193; Bhattacharya 2005: 54; Chun 1996: 63; 呂大樂 1997: 15)。不過，在回歸之前，這樣一種香港人的獨特性並不妨礙同時將自身視作是「在香港的華人」或「中國人」這些多元的身分認同 (multiple identities)，「香港人」同樣也是「港澳同胞」(Mathews et. al 2008: 9-10)，這可以說是一種務實與彈性的身分策略 (Ortmann 2018: 119)。到了回歸之後，香港人開始經歷了一場「再民族化」(renationalization)過程 (Fung 2010: 600)，也就是在北京與特區政府由上而下的融合政策與愛國教育中「重新」成為中國人，而在這樣的融合過程中反而使得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差異「被問題化」(problematized)了，在中港的矛盾與衝突中，真實的中國反而被建構成「他者」(Chan 2000: 508; Ip 2015: 413)，香港人開始想要去「保衛」香港的價值與獨特性 (Hong Kong's distinctiveness) (Fung 2010: 595; Yew and Kwong 2014: 1091)。總體而言，在這個階段的研究，儘管強調香港在地意識的萌生與獨特性，不過，研究者大多將此種香港認同視作為一種「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或「地方認同」(local identity)的層次，從而對立於中國的「民族認同」、「族群認同」。當時研究者的思考方向仍是「在這多樣性的認同之中，如何能共存而不分裂，所需

要的是一種對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新界定」（Bhattacharya 2005: 70），「關鍵的是如何順利地接受中國民族主義，而同時保留住在地感」（Fung 2010: 596）。隨著中港關係的激化與矛盾，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和 2016 年的旺角衝突之後，「本土主義」開始成為學術研究焦點，並且，研究者也不再將香港人的自我認同視作僅僅是一種「社會」或「地方」認同，而是上升到「民族」認同的層次，並且將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衝突視作是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對抗。例如，方志恆認為中港融合過程中產生了一種「中心—邊陲」的矛盾，這樣的矛盾導致了香港興起了一種邊陲民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與作為中心的中國民族主義產生了對抗關係，他稱為「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Fong 2017: 524-525）。吳叡人也從邊緣民族主義的觀點解釋香港作為一個弱小民族的政治處境，他還進一步將香港、沖繩和台灣進行跨國對照，三個地區都處於帝國邊緣而強烈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但社會內部都同樣出現一種自下而上反中心民族主義的力量（Wu 2016: 687-688）。

2016 年以後出現多篇有關香港本土主義興起的研究論文，蔚為一股研究熱潮。這股熱潮基本上與旺角衝突之後，「本土民主前線」（Hong Kong Indigenous，簡稱「本民前」）的核心成員梁天琦投入新界東立法會補選獲得高票，以及其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多位非傳統泛民候選人當選的政治情勢有關，而所謂的「本土派」更成為香港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本土意識研究上的焦點。鄺英豪（Kwong 2016a: 65; 2016b: 429, 437-438）以「國家—社會」衝突的架構，提出在香港社會中產生了一種反中情緒導致本土主義的興起，特別是本土派團體的出現。Luke Cooper 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觀察香港本土主義與本土派團體（特別是本民前和熱血公民〔Civic Passion〕）的發展，他認為這些團體不同於傳統泛民派固守著一國兩制的架構，而是要去超脫香港不能自我作主的異化狀態（Cooper 2018: 103-104）。然而，相較於上述相關的研究，本文對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析並不只將本土意識的發展侷限在本土派團體身上，或者純粹

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界定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因為，如果直接套用民族主義的相關概念與分析將會忽略了香港當前「本土」概念背後所內含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而如果僅以「本土派」來詮釋或代表香港的本土主義更會忽略了香港本土意識在過去近二十年的歷史與社會過程，簡化了香港本土論述內容的複雜性，以及抗爭行動上的分歧與整合。所以，筆者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不能是一種純粹概念式的界定，而需要將其視作是一種廣泛光譜式的分布，並且，在這光譜上的一條主要區分軸線就是，不同行動者與團體在面對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結構下，對於追求香港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自主性（autonomy）有著不同的未來想像、政治議程的設定以及具體的行動方案。更進一步來看，本文的分析將不僅只是放在中國民族主義與香港本土意識之間的對立，更試圖去關注在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過程中，不同團體與行動者在這光譜上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將會對應著不同的認知框架與論述內容，進而影響到不同行動者與團體間行動的方式、抗爭策略的運用，乃至於不同位置之間的衝突與整合。在社會運動的相關研究取徑中，David A. Snow（2007: 380-381）就十分強調理念因素（ideational factors）和詮釋過程（interpretive process）對社會運動整體運作上的影響，以及認知框架與集體行動的關連。這樣的分析進路也會有助於我們連繫到上述對中國因素反作用力中關於「認知」面向的探討，以及不同認知形塑出不同的反作用力。

三、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從 2003 年港人反「二十三條」立法一直到 2016 年第六屆香港立法會選舉這段期間，在中國因素下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進行分析與討論。³ 筆者之所以選擇這個階段的原因在於，

3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與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

2003 年標誌著回歸後的新階段，在五十萬人上街反「二十三條」立法讓特區政府暫時擱置相關法案之後，卻也使北京政府調整了對香港的政策態度，從初期不干預（井水不犯河水）到積極介入（Fong 2017: 527; So 2011: 109; Yew and Kwong 2014: 1092），而同年也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 CEPA）簽訂的時間，中港的進一步融合卻逐步帶來更多的社會矛盾，進而開始鬆動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原先由民主回歸論支撐的民主運動逐漸失去它的說服力，論述領導權的位置開始騰空了出來（陳景輝 2013: 33）。而從 2016 年的新界東補選到同年的立法會選舉，則開啟了建制／泛民／本土的選舉版圖，無論是自決、港獨等新本土意識正式站上了香港的政治舞台，而原先不同的本土意識或論述也在選舉過程中以政黨組織的方式具體呈現出來。所以，從 2003 年到 2016 年這段期間，可以讓我們觀察到在中國因素下香港本土意識發展與變化相對完整的圖像。如同前述，香港人在殖民地時期已從經濟發展與流行文化等面向獲得一種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元素，不過，到了 1980 年代必須面對中國的統治，原先的多元身份認同將進行一種「再中國化」，這觸動了香港人對自身政治處境與自我命運的思索，香港不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到了 2003 年之後，隨著中國因素作用力的增強，一種更為明晰的政治化過程開始在香港出現，這個過程的兩條軸線就是「從去中共化到去中國化」以及「從中國人轉變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中國開始成為香港的「他者」甚至政治意義上的「敵人」（殖民者）而建構著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

為了對當前香港本土意識如此碎裂而複雜的經驗現象進行探討，筆者在具體的分析策略與研究架構的建立上將借用韋伯（Max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由於這樣的立法將會使港人的政治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經過 2003 年 50 萬人上街抗議之後，特區政府撤回二十三條立法草案，至今仍未有具體的時間表，在當時此一運動也強化了港人以公民社會自我防衛的信心（Ma 2005）。

Weber) 類型學的觀點，嘗試將香港當前本土意識的發展進行不同「類型」(type) 的建構。如此將使我們可以進行不同類型之間的比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從而突顯出不同類型之間的分歧和差異，鋪陳出香港本土意識的論述光譜。如同韋伯所言，類型建構是研究者面對複雜經驗世界的一種研究工具，是一種「遠離現實的建構」：「理念型愈是尖銳而明確地被建構出來，意味著它愈遠離真實的世界，但在這層意義下反而愈能夠善盡其責，達成它形塑專門概念、進行分類和啟發上的功能」(Weber 1993: 44-45)。當然，同一類型之間可能出現的異質性，以及不同類型之間可能出現的流動性與重疊性，筆者將會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對於理解上重要之處盡可能的予以呈現。基本上，這些類型建構所仰賴的是筆者於 2015 年底至 2019 年初這段期間至香港所進行的深度訪談、田野觀察和文獻蒐集作為基礎，從而建構出不同類型的重要內涵並加以比較與分析。⁴

在目前香港本土意識的碎裂而多元的發展中，我們嘗試從兩個層面來建立一種類型的分析架構：首先，在面對中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論述上，香港社會在 1980 年代後浮現出「民主回歸論」，在議會政治與民主運動上形成了一種「建制／泛民」的對立，建制派捍衛北京與特區政府的政策和意識形態，強調一國兩制下的中港融合，泛民派則是傳統香港民主運動的擔綱者，以民主回歸論為基礎試圖在一國兩制下通過不斷的政治改革來實現香港全面的民主發展（如：特首、立法會的直選）。⁵ 而在 2003 年後許多重大的在地抗爭事件與中港矛盾而出現了不同的「新本土論述」。在研究上，「民主回歸論／新本土論述」是第一個層次的區分和類型化工作；第二個層次則是關注

4 本文引用了 16 場深度訪談資料，受訪對象包括政黨核心幹部、社運活躍分子、大學學生會重要幹部、大學刊物主要編輯、公共知識分子等（參見附錄）。筆者曾親身參與六四維園紀念晚會兩次，並多次至選舉與社會運動場合進行實地觀察。

5 香港立法會共有 70 席，其中直選席次和功能組別各有 35 席。以 2016 年的選舉結果來看，建制派的主要政黨包括：民建聯（12 席）、經民聯（7 席）、工聯會（5 席）、自由黨（4 席）、新民黨（3 席）、新論壇（1 席）、勞聯（1 席）。泛民派的主要政黨包括：民主黨（7 席）、公民黨（6 席）、社民連（1 席）、工黨（1 席）、人民力量（1 席）、街工（1 席）。

在新本土論述中的分歧和整合，我們嘗試建構「本土左翼—民主自決」（自決派）、「本土右翼—民族自決」（本土派）這兩種類型，這也是本研究關注的核心點。總體而言，在香港本土意識的光譜上有三種主要類型的分布，它們共同對抗著中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論述（建制派）：民主回歸論（泛民派）、「本土左翼—民主自決」（自決派）、「本土右翼—民族自決」（本土派）。這三種類型在這連續光譜上的主要差異表現在「從『中國化』到『去中共化』到『去中國化』」以及「從『中國人』到『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這兩條政治化的發展軸線。主要的分析架構參見圖 1：

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將會發現到，不同的論述劇碼（discursive repertoires）就在這兩個不同的層面進行相互辯證，從認同與爭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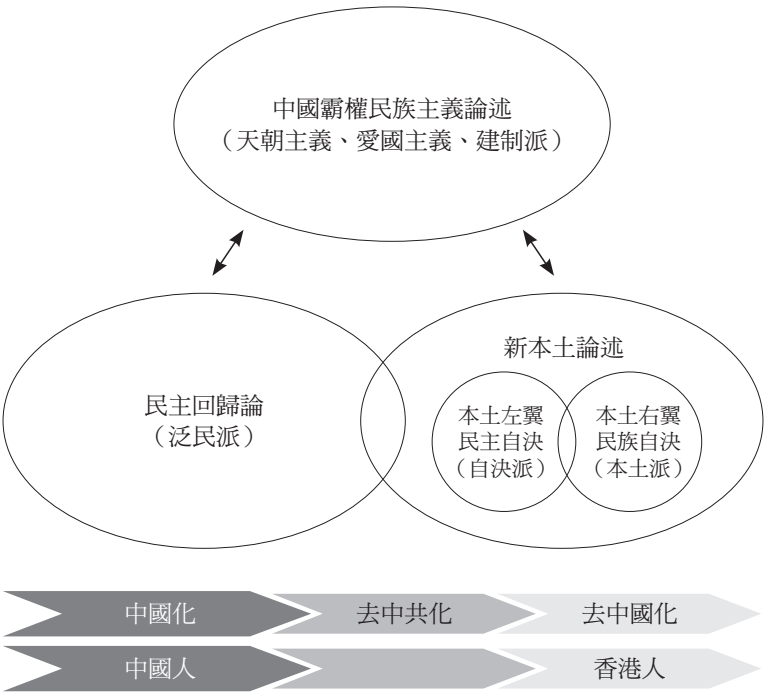


圖 1 中國因素與香港本土論述圖示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揚棄和提煉出自身的觀點。⁶ 此外，由於韋伯的研究特色在於對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的理念層次進行分析，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觀點就是在社會世界中不同的理念會有不同的擔綱者（bearer）來承載，擔綱者可以是個別的行動者、團體乃至於整個社會階層。所以，援用這樣的思考，我們可以說不同的本土論述類型就會有不同的擔綱者，例如，民主回歸論長期主要的擔綱者就是支聯會與泛民政黨等，在自決派的旗幟下則是以黃之鋒、羅冠聰等人的香港眾志為核心代表，並整合了左翼社運出身的朱凱迪等，本土派的代表組織則是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熱普城等等。不同本土論述類型的擔綱者彼此之間基於理念或利益上的差異而在相關場域中進行爭奪。至於何種論述會成為在地抗爭中具支配性的「主導框架」（master frame）（Snow 2007: 390）？就目前的研究架構來看，基本上，每一種論述在場域中的建構和維繫都會有它相應的行動者或團體來加以擔綱，進而會形成影響未來行動的論述框架或「框架轉型」（frame transformation）（Snow 2007: 393），而由於社會的在地抗爭或論述之間的鬥爭，都有可能會進一步改變原本論述框架中的內容或界限。所以，「本土」作為一種象徵符號並非是靜態建構的，而是我們必須要從一種動態性的個別論述框架之間的象徵鬥爭中來加以掌握。

四、香港本土意識的開展： 從民主回歸論到新本土論述的浮現

（一）民主回歸論的延續與挑戰

基本上，香港當前本土論述的共同對手就是「中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論述」，簡要來說，中國霸權式的國族主義論述以北京的中國

6 Marc Steinberg (1998: 856-7) 參照 Tilly 「抗爭劇碼」的概念提出了「論述劇碼」來做為研究社會運動框架的一種概念進路，他強調論述劇碼是在一種與對手互動中發展出來的。在本文的分析中，我們會看到香港新本土意識的類型不僅是與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對立，更重要的是在與傳統民主回歸論的對立互動中醞釀出來的，特別是「泛民／本土」、「和理非／勇武」這樣的對立。

官方民族主義為核心，其重要的論述內涵包括了「愛國愛港」、「人心未回歸」等等。⁷ 此種論述也同時引發了所謂「中國天朝主義」的批判，此一概念的內涵在於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天下」來作為政治上的引導性規範，進而將其周邊地區「再國族化」（中國化、認同中國）並壓制周邊地區自身的獨特性和主體性（陳冠中 2012: 87-97）。從筆者的分析來看，在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後，面對著中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論述，香港社會首先開展出「民主回歸論」。

民主回歸論出現在 1980 年代的香港社會之中，中英兩國開始對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然而，被排除在談判過程之外的香港市民，開始感受到 1997 年回歸祖國的疑懼和不確定性，社會上許多主張紛紛出籠，例如：維持現狀、中英共管、聯合國託管、香港自決論等等。民主回歸論可以說就是一連串政治辯論的產物，它能成為主要的論述方式，當時的大學生可以說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⁸ 那時學生們在校園中也對香港前途爭論不休，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就反對「維持現狀」的主張，並堅持以「民族」（中華民族）和「民主」（中國民主）兩大原則來面對九七問題，也就是要在「民族」原則外加上了「民主回歸」的外衣，進而提出「港人民主治港」的訴求（黃洪 2014）。學生也採取了一些具體的行動，一方面基於「民族」的原則，對當時來訪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提出抗議，反對其「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論」。另一方面，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和香港大學（港大）的學生寫信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表達在民族回歸的同時必須在香港實行民主。趙紫陽回給了學生正面的回應，他在回覆港大

7 所謂「愛國論述」就是要認同中港政權，否則就是阻礙進步的「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分子（許寶強 2015: 95-96；林緻茵 2015）。近年在香港出現「愛國團體」，台灣則是所謂「統派團體」，它們會在不同的社會場合與立場相左的團體，如香港的「藍絲」與「黃絲」，台灣的「愛國同心會」與「獨派團體」，彼此會互相叫囂甚至演變成肢體衝突，這也可以說是由中國因素所形塑的一種社會內部的分歧，甚至於代理人的鬥爭（Cheung 2018: 273-274）。

8 前嶺南大學教授羅永生在 1983 年時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他也是在機場向柴契爾夫人抗議的十餘名學生之一。他在口述歷史資料中回憶當時的情況：「學生的想法從哪裡來？其實是有協調的，民主回歸是中共統戰的其中一個方式」（馬嶽 2012: 65）。

學生的信函中具體提到：「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轉引自蔡子強 2014）。總體來看，民主回歸論者以民族的原則來體現了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一種愛國情操），而民主的原則則是向中共表達對兩制的堅持，也就是以民主作為保衛香港的方式。民主回歸論者相信，只要回歸後香港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落實民主的實踐，必然有助於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政治進程。這就是所謂的「袋住先」，先回歸後民主，但是，民族的原則實際上仍是具有優位性的。正如當年鼓吹民主回歸論的核心要角之一曾澍基（1982: 1）在反駁維持現狀論時提出：「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始終要回歸到祖國的懷抱，無論從民族主義原則或實用的政治經濟考慮出發，這都是不爭的結論」。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對民主回歸論無疑是一個打擊，天安門的血腥鎮壓強化了香港社會抗共的情緒。不過，弔詭的是，民主回歸論的支持者並不因此而否定了自身的論述，反而許多人秉持著對中國的情感與承擔投入了香港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也就是香港人要基於愛國的情懷更積極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這也是為何香港後來年年紀念六四事件的基本動力。支聯會的領導層與其後民主黨等主流民主派（泛民）的領導層相互重疊，儘管與中共決裂，但卻保持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論述層次上與中共比誰更愛國，這個愛國的心結，成了香港民主派的緊箍咒（孔誥烽 2014: 55）。在 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國人大常委針對香港 2017 年普選做出了完全不符港人期待的決定，也就是所謂的「八三一框架（決定）」，⁹ 在當天 62 位香港大專院校的學者共

9 人大常委會於 2014 年 8 月 31 日作出了三項決定：（1）2017 年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只有提名委員會，而人數、組成和委員的產生辦法，依舊按照現行由 1200 人，四大界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辦法。（2）特首參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提名，才能出閣選特首。（3）限制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 2 至 3 個候選人。此三項被稱為「落三關」的人大八三一決定已經為 2017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定下了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組成、委員的產生辦法和候選人出閣門檻等具體框架。

同署名發表〈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其後雙學¹⁰更進而發起罷課以及後續爆發的雨傘運動，極大程度的衝擊了香港傳統的政治與社會格局。原先港人期待的普選變成北京篩選，在當時憤恨的情緒中激化了港人對一國兩制下中港關係的不滿，並對民主回歸論所支撐的傳統抗爭策略與民主運動模式進行質疑（羅永生 2018: 24），那些三十年前支持民主回歸論的學生，後來成為社會的中堅與泛民的領導者，在這一刻也成為學生批判的對象，民主回歸已死的哀嚎不絕於耳。

從本文的角度來看，儘管民主回歸論一直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主導框架，不過，自從 2003 年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運動興起以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已開始動搖。此外，不同於民主回歸論的本土意識也開始在醞釀。香港人從早期的「恐共」（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陰影猶存）、「去北」，到現今則是以一種「去中共化」（結束一黨專政）、甚至於「去中國化」（港獨）的認知態度在面對中國因素。目前主要幾個發展較為成熟且在公共領域發生影響力的新本土論述內容包括「城邦論」、「解殖論」、「民族論」等等，不同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香港社會在回歸前後不同階段的轉變（鄭祖邦 2015）。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筆者嘗試在香港當前複雜而多元的新本土意識發展中建立兩種主要的分析類型：類型一、「本土左翼—民主自決」；類型二：「本土右翼—民族自決」。從論述發展的系譜來看，前者可以從陳允中的「開放本土」、羅永生的「解殖論」、陳景輝的「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到 2016 年立法會選舉中香港眾志和朱凱迪所提出的「民主自決」（2016 年選舉時稱為「自決派」）；後者可以從陳雲的「城邦論」、香港大學《學苑》的「香港民族論」到業餘史家徐承恩（2017）的「香港民族史」，以及近年興起的本土

10 在香港所謂「雙學」是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反國教運動時中學生組織的「學民思潮」。學聯是由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所組成，在 1958 年成立，也是支聯會的創始會員。2014 年由於雨傘運動的成果挫敗，雙學被認為領導運動不力，隔年多間大專院校醞釀退聯，經校園投票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相繼退出。

民主前線和青年新政等本土派團體。兩者環繞著本土的「左翼與右翼」一直到近來「民主自決與民族自決」進行著論述制高點或在地抗爭的政治領導權之爭奪，並帶動了民主回歸論之後的論述轉型。

（二）新本土意識的開展（I）：左翼與右翼

自 2003 年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運動興起以來，真正讓本土左翼的論述和價值得以開展，並非直接由政治事件或中港矛盾所引起，而是都市空間的規劃和開發、土地的保育和利用等問題所引起的抗議事件，例如，2003 年底利東街（喜帖街）的重建與保留、2006 年 11 月反對天星鐘樓清拆（陳景輝 2009: 29；梁啟智 2009: 26）、2007 年皇后碼頭的保育、2009 年後菜園村反高鐵運動等等，整個香港社會更關注諸如「集體記憶」與「本土文化」等相關議題。這些抗議事件牽動了香港對殖民性格的反思，一種從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下來的行政暴力與不民主體制，其中涉及了反對地產霸權、香港政治中的官商特權階級。起初左翼本土意識的醞釀並不是在尋求一個國族的框架，而是在反思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過程中試圖確立自身的價值與主體性，並藉此提出一個在政改之外思考香港社會議題的方向。不過，此種以公民培力、社區工作為基底，以及底層弱勢階級的關懷為主導的本土論述方向，在陳雲 2011 年出版《香港城邦論》一書之後出現了新的變化，香港的新本土論述出現本土左翼與右翼的分歧。

在 2011 年，時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陳雲¹¹ 出版了《香港城邦論》一書，他強調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必須如同歐洲中世紀的城邦（city）一樣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利（相對於封建領主的城市自治）。為什麼會提出「城邦論」的構想呢？就陳雲的說法，是因為

11 陳雲本名陳雲根，在 2016 年因宣揚城邦論和香港自治的言論被迫失去教職，其後參加 2016 年立法會選舉但並未當選。在《香港城邦論》出版之後帶動本土風潮，被稱為「港獨之父」，不過，其言行多變，個人臉書上往往留下激烈言論，即使在本土派陣營中仍是毀譽參半。

在 2011 年發生了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規劃事件及大陸孕婦來港產子事件，這觸犯了香港人的城邦地理及移民政策，香港人忍受不了而發起自保運動。所謂宜居灣區規劃就是指 2010 年底，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畫》，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中山六個地區融合成一個巨型都市群，香港的郊區以鐵路和道路打通成為住宅區。陳雲認為以上規劃會稀釋了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毀滅香港獨特的城邦格局。因為，巨型都市群將擴大了珠三角，破壞香港的邊界和郊野，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並且，郊區住宅區的形成將使得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地產的力量使香港本地窮人將被迫內遷大陸。如此，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仕紳化，打破原住人口的身分認同和共同價值。¹² 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族群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陳雲 2011: 145-150；2012: 182-185）。

至於大陸孕婦來港產子事件，香港輿論視為「蝗蟲侵入香港」，而陳雲認為這直接造成了香港福利資源的排擠，新移民造成了社會的矛盾，引發福利政策的原住民資格與權利的論辯，進一步催生了香港的族群意識，思考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有高度自治的原則（陳雲 2011: 150；2012: 185）。他認為香港的公共政策需要以香港人為依歸，香港的穩定繁榮必須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和資源安全，港府必須以城邦自治的政治判斷來考慮問題（陳雲 2012: 192）。所以，香港在移民政策上必須有主導權，同時收回內地移民的審批權（而非在中國的手上），並採取措施限制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獲取居留權。新移民只要服膺香港《基本法》憲政體制下的自由民主精神，融入香港的風

12 2017 年 3 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二屆人大會議中正式推出粵港澳大灣區計畫，同年 7 月 1 日，在習近平訪港時，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與協議》。大灣區計畫的推行也再度讓香港人不禁質疑：「未來我們是大灣區人？還是香港人？」區域經濟整合一直是中國重要的統戰手段，類似的手法也出現在台灣身上，例如，從 2009 年開始規劃的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就是試圖透過區域經濟的概念來消滅台灣在地域上的主體性。除了大灣區計畫，爭議多時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在 2018 年 9 月通車，透過高鐵加強對中國邊區的控制一直是中國重要的手段，不過，在西九龍站所安排一地兩檢的作法卻引發極大爭議。

俗文化，香港人不會吝嗇給予福利補貼與優惠照顧，所以，香港人談的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族群文化意識的問題（陳雲 2011: 152）。

基本上，陳雲的城邦論並未挑戰中國對香港的統治，他也從未公開支持港獨，在 2014 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論 II》一書中，還延續了「國中之國」的想法提出了華夏邦聯論這樣的政治構想，他主張整個中國應該以香港為中心，因為香港更能承繼中華文化的道統。在雨傘運動後，他還提出了「永續基本法」的主張，而這個主張後來成為「熱普城」在 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共同競選政綱。與此相較，真正對後來本土派或年輕世代產生影響的是城邦論在行動方向所強調的「中港區隔」（人口、族群、地理界線上的區隔），以及在抗爭方向所採取的「勇武抗爭」（例如：對中國水貨客的驅趕）。陳雲批判泛民的「和理非非」和那些儀式性的民主運動傳統，諸如七一遊行、六四晚會等都只是一種「維穩社運」，在關鍵時刻只會解散群眾（散水），行動永遠不會升級，難以真正達成抗爭訴求。¹³ 這些主張在香港社會引起了許多爭議和討論，甚至引發在本土論述上所謂的「左右之爭」。陳雲（2013）在《香港遺民論》一書中一方面大肆批判那些還在紀念六四事件的民主回歸論者，認為他們中了「中國情花毒」將會危害香港，六四晚會是一場「露天精神病治療大會，年年都要去複診」；另一方面，他從本土政治與族群鬥爭的立場痛批那些擁抱平等、人權和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左翼本土論者，這些人不夠勇武只是離地賣港賊（陳雲 2015）。此外，他還為這些左翼論者貼上一個特別的標籤——「左膠」（「左膠」一詞最早於 2008 年在網路上出現，後來還出現「大中華膠」），這些左膠被視為是包庇大陸人入侵擾亂、破壞香港社會的幫兇（葉蔭聰、易汶健 2014: 165）。總體而

13 在當前香港的抗爭場合中，可以區分出三種抗爭形式或抗爭劇碼分別對應了三種論述類型：傳統泛民的「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言穢語）以七一遊行為代表，本土左翼的「公民抗命」以雨傘運動期間雙學領導的金鐘佔領區為代表，本土右翼的「勇武抗爭」以雨傘運動的旺角佔領區和 2016 年旺角衝突為代表。正是由於不同抗爭策略的認知，在反新界東北開發和雨傘運動期間彼此之間就因是否要進行行動升級（升高與警察衝突等）而有所衝突，並相互指責。

論，城邦論所引發的左右之爭，使得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從對外抵抗中國的霸權論述，轉而變成一種內部的鬥爭與矛盾；或者說，城邦論的勇武本土主義經由外在的真實對手，以及對內的批判（民主回歸論或左膠、大中華膠都不夠勇武），確立其自身的形象。正如一位支持港獨的訪談者說：「本來沒有什麼本土派，只是一群反對泛民的人，沒有泛民的話沒有本土派」（訪談編號 HK180101）。

長期深耕社區工作並積極參與保護皇后碼頭運動的陳允中，在 2013 年 5 月 29 日的《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短文〈開放派與土著派的本土想像〉，他提出「開放本土」的概念，針對陳雲的「中港區隔」提出反擊，將當時的城邦自治派稱作「土著本土主義」。他明白表示「本土行動（開放本土派）堅持，任何人只要立志將香港當成唯一安身立命的城市，放棄上一代人用腳投票（移民）的投機心態，就是本土派」（陳允中 2013）。陳允中從反高鐵護菜園的運動經驗中發現，在經歷了城邦派的「反蝗三部曲」¹⁴ 之後，讓原本反發展主義、反「官一商一鄉」利益集團勾結強逼拆遷的左翼土地正義運動，變成了反「割地賣港」、反中港融和、保衛香港族的右翼行動，「保衛國族的想像」進入了原本的社運脈絡取代了「保衛家園的想像」，運動所動員團結的「我們」不再僅是底層的菜園村居民而是全香港人（陳允中 2014: 191, 193）。陳允中痛斥，這個由八〇後的青年所推動的左翼進步社運就此分裂，也影響到了後來反新界東北開發的抗爭，「香港人優先」成為人人都要表態的問題，國族認同作為一種情感動員，標籤取代了論證（陳允中 2014: 195-196）。族群式的本土主義如同中國民族主義一樣，把香港正常的民主政治爭議上升為「敵我」矛盾（羅永生 2013: 3）。

陳景輝是香港八〇後參與社運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雨傘運動期間他和葉寶琳、林輝三人的頭像被本土派製作成海報，標題寫著「慎

14 指 2011 年的反雙非（反對大陸人來港生子及來港上學）、2012 年的反蝗（反陸客自由行）、2013 年的反新移民（要求減少派給新移民入境配額，俗稱單程證，反對新移民綜援撤限案）。

防左膠騎劫集會」、「勿信左膠 提防散水」、「香港人要贏 左膠要走」，對三人進行了強力的人身攻擊。陳景輝（2014）認為左／右翼的辯論涉及到對政治共同體構成原則的不同計畫：《香港城邦論》所引領的右翼立場就是以族群的方式將香港人「民族化」（廣東話、繁體字、港英旗等），塑造「大陸族群劣質性」（將中共的專政與大陸族群性等同）作為敵人，以此凝聚共同體的團結與認同。然而，這樣的團結也同時在製造排斥（右翼琅琅上口的「出賣論」、投共維穩等），這樣的人民缺乏公共性，漠視多元社會的合理分歧。相較而言，香港左翼形塑的團結基礎在於自由民主的公民文化，奠基於在地公民抗爭的傳統和實踐，例如 1966 年天星碼頭的蘇守忠抗爭，或不以「中環價值」（以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作為至高的原則）為核心，轉而通過小店、小社區和舊建築物建構成為平等的城市本土性（保衛菜園村），這也就是通過對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的衝撞創造公平而正義的城市空間，讓人們對這個城市擁有真正在地的歸屬感。八〇後所進行的保育運動創造出一種「後物質主義的價值」（post-materialist values）重新界定了城市的歷史與認同，挑戰了傳統上以自由經濟、發展主義為導向的政府政策與核心價值（Ma 2011: 706-708），並且將城市的發展聯繫上民主的規劃、和市民的認同（Ku 2012: 18）。

如果仔細檢視當時的抗爭行動，我們可以發現到在反高鐵運動期間雙方人馬是站在一起的，面對高鐵興建這個大白象工程，運動者訴求香港不是「被規劃」而是「有平等的參與、平等的權利去決定，香港政府有尊嚴一點」（訪談編號 HK160207）。當時左右派立場的分歧並未檯面化，參與其中的陳雲還提出「快樂抗爭」的想法。不過，後續的抗爭行動就逐漸分化開來，陳允中、朱凱迪、葉寶琳等人回到菜園村種田，尋求原村搬遷的出路和爭取居民的權益。不過，右翼抗爭者的想法已經逐漸改變，一位參與成立熱血公民的訪談者就回憶：「後來左膠、左翼那一幫人，比如說朱凱迪他們就突然消失掉，他們選擇了去種田。突然有幾年他們不見了這樣」（訪談編號 HK190106）。他還提到自由行帶來的中港衝突，特別是 2012

年 D&G 店面禁止香港人攝影（中國人卻可以），引發了香港人的抗議，「D&G 事件對我們這群人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事件。我可以這樣說所謂本土運動的萌芽或者什麼也好，應該說是 D&G 事件」（訪談編號 HK190106）。其中一批人就以黃洋達為首領成立了熱血公民，他們也以陳雲城邦論做為行動的理論基礎，進行驅趕中國水貨客的反蝗行動，並投入 2012 立法會選舉。從反高鐵到 2012 年反國教運動這段期間算是香港新本土意識重要的啟蒙階段，左右的路線分別激勵了不同的年輕世代。八〇後這一代的保育人士，從天星碼頭到反高鐵菜園村的抗爭中，這些努力直接體現到反國教的黃之鋒、保衛新界東北的何潔泓、雨傘運動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這些新一代抗爭者身上（陳奕廷 2015: 188）。相對地，在中港矛盾的社會衝突下，當時陳雲的城邦論對熱血公民、香港大學《學苑》的民族論、乃至於後來的本土民主前線另一批年輕世代產生了衝擊，更從城邦自治的構想推向了香港獨立的主張。

總體而言，香港當時本土議題是以左／右翼的區分方式來呈現，其分別不在於「階級」的視野，而是以「公民多元差異」或「族群同質性」來作為公共意志與共同體構成的原則，左翼認為對抗的是特區政府與共產黨，右翼則在「中國人／香港人」身分族群的劃分下與「中國人」產生對立。一位左翼社運人士說：「對反蝗蟲或雙非子女我們已會關注，但我們不會把矛盾放在中國因素那邊，不會把新移民啊，或是內地人標籤，我們是想從政府的角色和政策的問題去解決。但我們的建議在主流上沒有很大的煽動性，跟市民的情緒沒有很好的聚接起來」（訪談編號 HK160207）。不過，從論述發展的角度來看，八〇後的保育青年早已運用了「本土」這個符號，像是在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中就成立一個「本土行動」組織，並且還租了一艘船命名為「本土號」以人民登陸皇后碼頭來象徵解殖（Chen and Szeto 2015: 438）。只是在面對城邦論出現，本土論述開始被右翼想像壟斷之後，促使原先的本土左翼進行了論述框架的移動，也就是從原先關心的焦點在於城市空間的規劃、弱勢階層的抗爭也開始提出對香港作

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想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與右翼本土開始競逐本土想像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所以，我們認為儘管方向上雙方有所分歧，不過，在中國因素的作用力下卻也整合在追尋何謂「本土」的歷史道路上。

（三）新本土意識的開展（II）：民主自決與民族自決

陳雲在城邦論中提出「中港區隔」的主張，也就是強調「邊界控制是共同體有效運作的基礎」（鄭健銘、何俊霆 2015: 44），確實對當時香港的年輕世代¹⁵有著很大的思想衝擊，一個具體的結果就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出版了《香港民族論》一書。當時參與編輯的同學回憶道：「所謂本土思潮那時有一些人寫了一些文章，比如陳雲的，然後結合在你的生活經驗，你的反思在一起，你就覺得啊，為什麼自己沒有想到，為什麼我對主流政治論述不滿時，不懂得去表達或去思考另外的……陳雲那個時候是蠻有影響的」（訪談編號 HK150102）。不過，學生們的論述視野並不停留在「城邦自治」、「華夏邦聯」這些想法，而是進一步從現代民族主義的視角直接觸及到「香港民族」的議題，這就使得香港民族主義乃至於港獨的話題浮上檯面。

《香港民族論》一書於 2014 年 9 月出版，是以 2 月即已出版的《學苑》當期的專題「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所刊登的文章為基礎，¹⁶當時負責編輯的同學共發表了四篇文章，加上港台五位相關學者的文章，得以集結成冊。此書的出版正值香港社會強烈要求政改與真普選的階段，出版數天後便爆發佔中運動及雨傘運動。在 2015 年 1 月 14 日，香港特首梁振英赴立法會進行施政報告時，大力抨擊《香港民族

15 香港目前的「年輕世代」主要是指「九〇後」（1990 年）出生的，也就是回歸之後才出生的一代，這些大學生是香港本土派重要的支持主力之一。前述陳景輝等左翼社運者通常則被稱作是「八〇後」，成長的背景與經歷的確讓兩個世代在路線上有所不同。

16 「民族自決」這樣的旗幟已經在標題上浮現出來，而「命運自決」後來也成為雨傘運動大台所使用的標題。另外，民族論的思考早於同年雨傘運動爆發之前，這些想法或許都埋下了在雨傘運動期間與金鐘大台領導階層的意見差異，最終表現在傘運結束後各大校園的退出學聯行動中。

論》一書鼓吹港獨，意外地使這本學生刊物受到香港人的關注，爭相購買，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從書中幾篇文章的討論可以發現，對香港作為一個「民族」的思考已躍然紙上，並且無可避免地直接碰觸香港獨立或香港民族主義的問題。主編梁繼平在序言中宣稱：「《香港民族論》正正希望打破香港作為民族的思想禁區，將民族論述正式帶入公共辯論與實踐，並邀請所有支持民主治港的朋友，一同思考港人民族身份的問題」（梁繼平 2014: 11-12）。而在論述內容上，該書一定程度延續了陳雲的想法，特別是關於中港區隔的主張，時任副編輯的王俊杰指出：「所謂本土精神，不論形式是否香港獨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純粹奪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旨就是港中區隔」（王俊杰 2014: 45）。此外，他對左翼也有所批判：「俗稱『左膠』的離地左翼社運人士，他們受平等、反歧視、支持弱勢等意識形態所牢結支配，罔顧現實政治環境，漠視社會承載能力而處處偏袒新移民」（王俊杰 2014: 45）。不同於陳雲吹捧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夏邦聯，他們更著重於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整理耙梳，中港區隔不是熱衷於進行族群鬥爭，而是必須確立香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邊界，進而主張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思考（李啟迪 2014: 74-75）。從現實政治議題的發展進程來看，年輕世代對香港主體性與自主性的爭取，的確做出了更激進的表態。

雨傘運動結束之後，新任的《學苑》編輯委員會再接再厲，在 2015 年先後以「雨傘世代 自決未來」專題出版了《學苑》1 月號以及「除魅」專題出版了《雨傘革命特刊》。前總編輯梁繼平在 1 月號中發表〈民族、民主、雨傘革命〉一文，文中指出：「香港過往的民主運動明顯側重於爭取選舉制度，即『自己揀政府』，卻忽略思考背後的『自己』到底是誰……為何香港人不能擁有自己的民族身份，從而令『民族與國家的邊界是重疊並吻合』？……雨傘革命成功填補了過往三十年民主路所缺乏的強烈身份認同，它不是成功如民族這概念，與民主這概念相互補足嗎？」（梁繼平 2015: 30-31）1 月號的副總編輯陳雅明則發表了〈香港人意識：雨傘世代的命運自主意志〉，

他指出：「黃傘」將取代「六四」成為香港新世代的集體記憶，這也就是說，對這一代而言，香港的命運已經不寄託在中國民主化的發展上了，香港人不需要年年行禮如儀地紀念六四來召喚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對雨傘世代來說，追求民主最大的原因不是普世價值，而是屬於守護自己的土地，命運自主（陳雅明 2015: 26-27）。「香港民族論」的出現並不是《學苑》孤軍奮鬥的結果，事實上，近年來香港的年輕世代正在急速地成為本土派（本土右翼），¹⁷ 雨傘運動過後多間大專院校退出學聯，正是代表著對運動過程中雙學與佔中三子領導路線的不滿，「學生會、學聯、社運跟泛民是一個產業鏈嘛，所以你現在斷了學聯就是斷了他們產業鏈嘛」（訪談編號 HK160204）。此外，傘運後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選舉也都是持本土派立場的候選人獲得勝選。¹⁸

從 2015 年開始，香港大學學生會就不再出席由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六四紀念晚會，2016 年則在港大校園自辦六四紀念會和論壇，到了 2018 年八所大專院校學生會更是表明既不自辦紀念會也不鼓勵前往參加紀念晚會。然而，在八〇左翼社運青年的眼中卻認為年輕世代不願紀念六四是可悲的：「六四不僅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它是一個很香港的事情，是香港民主與政治的啟蒙。你認同本土，就要將這個很重要的香港民主抗爭的歷史變成自己的。本土的意思就是比你的生命還要長，你出生之前就在那裡了，你死後本土還會繼續存在」（訪談編號 HK180104）。八〇後這一世代也會認為支聯會行禮如儀的六四紀念晚會確實忽略了「當時香港的時空環境」，對 1990 年代香港自由民主氣氛的影響，而年輕本土世代的可悲性在於

17 2016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67 周年國慶時，香港多間大專院校同時出現同款以中英文寫上「香港獨立」的紅底白字直幡，儘管事後沒有任何學生組織承認，但是顯然這也是一種具集體性的抗爭政治。

18 在本土論述的生產上，除了香港大學的《學苑》之外，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的刊物《城大月報》也在 2015 年 4 月號的主題是「告別運動 繼續抗赤」，發表了〈馬克思：香港「左膠」背叛了左翼〉、〈以武抗暴乃是天經地義 匪賊當道焉能坐以待斃〉等文章。《學苑》在 2016 年 4 月號中就有〈以武抗暴 何罪之有〉、2015 年 4 月號則出現〈非暴力抗爭，盡頭？〉還有對當時的「光復行動」有專文討論。

不能將六四視作香港人在地抗爭歷史的重要一環。總體來看，在紀念／不紀念的分歧與喧囂中，左翼與右翼都在試圖重塑香港人的集體記憶，無論是左翼的「本土六四」還是右翼的另闢蹊徑事實上都是在不斷形塑屬於香港自身的主體敘事。

在 2014 年雨傘運動過後，對右翼本土派發展產生最大影響的事件當屬 2016 年 2 月農曆年初一晚上在旺角爆發的一場嚴重的警民衝突，本文稱這場衝突為「旺角衝突」（親中團體稱作「旺角暴動」，本土右翼稱作「魚蛋革命」、「旺角起義」），¹⁹ 此一事件起因於警方驅趕及逮捕無牌熟食小販。農曆除夕當晚，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因支持小販而被捕，事後她號召市民年初一晚上到旺角「撐夜市」。同一時間，本土民主前線亦號召民眾到旺角支援小販，本民前認為小販是本土文化，並且，其代表人物梁天琦正要代表參選 2 月底的立法會補選，想在支援小販的同時在旺角進行選舉遊行，結果與警察爆發嚴重衝突，有警員朝天開槍示警，示威者以磚頭還擊。這個事件起初是一個左右翼團體都有參與的抗爭事件，小麗老師屬本土左翼的陣營，然而，當本民前介入之後展開的警民對抗和勇武行動，也就使得整個事件的發展轉往本土右翼的方向。這個事件可以讓我們觀察到論述的認知框架對抗爭行動的影響，同樣是撐小販，如果從本土左翼的角度來看，這場抗爭的重點涉及到都市空間霸權的問題以及政府食環管理等相關政策（葉寶琳 2016）。而本民前被視為右翼本土派，該組織曾以所謂「光復行動」驅趕水貨客引發社會上的正反面評價。經此一役，本民前勇武抗爭的行動讓原先僅在陳雲書中的勇武抗爭得到了具體的發展和挪用（李祖喬 2018: 214），其候選人梁天琦在遭受拘捕、起訴之後為之聲名大噪，吸引了許多對現狀不滿的選民，其民調支持度因而大幅上升。這場補選也讓本民前所象徵的本土勢力獲

19 當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針對此一衝突許多香港媒體因立場和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賦予不同的稱呼，其中以「旺角騷亂」使用的媒體最多，帶有負面標籤的有「旺角暴亂」（東方日報、大公報、文匯報等）、「旺角暴動」（成報），其它如「旺角『騷亂』」、「旺角大衝突」、「旺角衝突」等，輔仁媒體則以「魚蛋革命」稱之。

得了在傳統「建制／泛民」之外的政治空間，²⁰ 形成所謂的「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之勢。一位本土派的支持者說：「旺角革命有它嶄新的意義，那晚我觀察到很多人真的很憤怒，他們是香港的青年啊！社會上沒有一個人可以代表他們的聲音，在議會裡面沒有，在公共討論沒有，就是不是主流。他們被壓迫的聲音無法表達，在旺角用暴力的方式表達出來，在一定程度上紓解了雨傘之後的壓力」（訪談編號 HK160206）。本土派的氣勢甚至讓泛民政黨產生「位移」也開始嘗試使用「本土」的符號（Kaeding 2017: 167），其後許多第三勢力也紛紛表態欲投入同年 9 月份即將舉行的新一屆香港立法會選舉，爭搶其中 35 席的直選名額，香港政治格局的改變也正在成形。

事實上，在本民前為本土右翼創造出政治聲勢之前，雨傘運動就已催化港人相當程度的政治覺醒（政治化），²¹ 儘管最終運動目標受挫結果不盡如人意，但是，在雨傘運動之後，許多原先在街頭抗爭的行動者或組織回到社區落地成立傘後組織，並試圖投入 2015 年的區議會選舉，這也就是所謂的「傘兵」²² 參政。這裡頭有許多是八〇、九〇後的世代，他們從原先的街頭和網路開始轉向奪取議會的席次，希望擴大基層社區的經營並宣揚自身的政治理念。由於香港區議會的選舉是採取單一選區制，在總數 431 席的席次中，最終建制派獲得 298 席（較上屆減少 11 席）、非建制派（泛民政黨、傘兵、本土派等）獲得 125 席（較上屆增加 25 席），其中傘兵參選人數有 51 席，最終當選 7 席。在經過 2015 年區議會選舉和 2016 年初的新界東補選之後，本土左翼與本土右翼對於 2016 年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更是躍躍欲試。不同於區議會的選舉方式，香港立法會的直選席次採取的是

20 2 月 28 日新界東補選的結果是由傳統泛民聯合支持的公民黨楊岳橋以 160,880 票（37.2% 的得票率）擊敗建制派對手民建聯的周浩鼎（150,329 票，34.8%），但是，歷經旺角衝突的梁天琦獲得了超乎原先預期的 66,524（15.4%）張選票。

21 蕭阿勤（2008: 28）在對戰後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上提出 1970 年代是一個「回歸現實的世代」，這一世代歷經重大事件的挫折（台灣退出聯合國等）而有所覺醒、啟蒙，認清台灣前途的現實擺脫 1960 年代的流亡心態，對後來台灣的本土化產生了重大作用。從對照的角度來看，雨傘世代或許也會創造出香港回歸現實的世代，在對民主回歸論的哀嚎中也讓港人認清了一國兩制的現實。

22 傘兵意即「明確認同普選、雨傘運動理念的參選人」，基本上傾向本土左翼居多。

表 1 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果表

	建制派	泛民派	自決派	本土派
2012	772,487 票 (42.66%) 17 席	1,018,552 票 (56.24%) 18 席	--	--
2016	871,016 票 (40.17%) 16 席	781,168 票 (36.02%) 13 席	175,084 票 (8.07%) 3 席	235,598 票 (10.86%) 3 席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比例代表制，在五大選區（港島區、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新界東）中依照選舉名單的得票數高低來進行分配（港島區 6 席、九龍西 6 席、九龍東 5 席、新界西 9 席、新界東 9 席），這樣的選制並不利於大黨運作也給予了新進第三勢力有所發揮的空間。從表 1 對此次選舉結果的統計來看，建制派獲得 16 席較上屆選舉減少一席，傳統泛民則顯然受到第三勢力較大的衝擊，從上一屆的 18 席滑落到 13 席，第三勢力自決派和本土派各取得 3 席，有近兩成的得票率。

第三勢力的 6 席分別包括了代表本土派的青年新政（Youngspiration）梁頌恆和游蕙禎、熱血公民的鄭松泰、代表自決派的香港眾志羅冠聰、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以及本屆的得票王朱凱迪（84,121 票）。事實上，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有投入新界東的選舉，不過，在選前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為截堵支持港獨的參選人，在 7 月 14 日要求簽屬認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部分的確認書，雖然梁天琦後來有簽署確認書，表達擁護《基本法》，並刪除陰書上支持港獨的言論，但是，選舉主任仍「認定」梁天琦不可能真正改變過去的主張及支持港獨的立場，裁定其提名無效，梁天琦「入閘」失敗。²³ 本民前退出選舉後轉而支持政綱較為一致的青年新政梁頌恆於新界

23 除梁天琦之外，還包括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支持港獨）、香港民主進步黨楊繼昌（支持港獨）、城邦派的中出羊子（支持港獨）、保守黨賴綺雯（要求香港回歸英國）、獨立參選人陳國強（支持港獨），總共六人皆被判定提名無效。

東參選。²⁴ 另一個主要的本土派參選集團就是所謂的「熱普城」，由「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和「香港復興會」所共同組成，主張「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²⁵ 基本上，此次選舉可以說有別於過去「建制／泛民」的傳統對立，呈現出一種百家爭鳴、各顯神通的狀況。從制度面的角度來看，香港的議會體制是一個有限的民主體制，在直選席次上採用的是單一選區多席次。在這些席次中，儘管親北京政府的建制派盤據了一定比例，但是，非建制派的參選人只要具備一定社會知名度，就有相當當選的機會，這也提供了不同本土論述在政治場域中各自取得一席之地的可能。由於是在一個大選區中競逐多個議席，這樣的選舉制度固然有利於新人出頭，但是卻很難形成政黨或候選人之間的合作，因為選票些微的分配不同就可能讓議席分佈結果不同，只要有聲勢或當選機會的候選人都不可能進行協調或放棄參選，如果再加上理念與策略上的不同，甚至於情感上的仇視或指責，自然更容易形成不同陣營間的分歧與對立（梁一夢 2018）。²⁶ 以香港 2016 年的選舉狀況來看，民主自決派基於相同的理念與利益形成了比較緊密的聯合戰線，右翼本土派陣營則呈現出各自為戰的現象。所以，香港的選舉體制使不同理念立場的行動者或團體缺乏整合的誘因，形成一種「多元化」、「極端化」或「部落化」的現象（Ma 2012: 169），參選人只要掌握與部份群眾的關係即可，不需要去尋求絕對多數選民的認同，所以差別只是形成大部落或小部落，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在這次的選舉過程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原先的本

24 本民前與青年新政的區別在於「本民前的路線比較偏向街頭，比較像社會運動那一種。但是青年新政，初始它是一個偏向議政的組織，或是更像研究」（訪談編號 HK160206）。

25 參選人包括了熱血公民的鄭錦滿、黃洋達、鄭松泰（當選），普羅政治學苑的黃毓民，香港復興會（城邦派）的陳雲。「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是黃毓民（2016）主要的主張，他並未完全同意陳雲「永續基本法」的構想，認為這是一國兩制的延續，這樣的內部分歧也是這個聯盟選後瓦解的因素之一。

26 在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前，佔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提出「雷動計畫」的構想，希望透過「協調參選」、「策略性配票」等作法來讓非建制派的直選席次一舉過半。不過，在這樣的選制以及不同陣營的複雜分歧下終歸難有所成。

土左翼在「自決派」（民主自決）的旗幟下逐漸整合起來。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由學民思潮和前學聯的成員組成一個新政黨「香港眾志」（DEMOSISTO），²⁷ 前學聯的秘書長羅冠聰擔任主席，學民思潮前召集人黃之鋒為秘書長。²⁸ 他們的理念是：「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以直接行動，策動公投和非暴力抗爭，推動政經自主；以香港本位，抗擊天朝中共和資本霸權，實踐民主治港的思想願景」。²⁹ 他們以運動型政黨自居，提出 2047 年香港二次前途問題，以香港人民民主自決的《香港約章》取代毫無正當性的《基本法》，作為該政黨最重要的政治議程與具體實踐的目標。其中一位創黨成員認為：「最關鍵的還是我們覺得我們是主張香港主權跟憲法要讓香港人去確定這個關鍵。主流的民主派比較保守比較不談主權、不談國際路線」（訪談編號 HK190103）。此外，香港眾志以近年在地抗爭的經驗來書寫民主自決的創黨宣言，他們的在地抗爭的系譜為：2003 年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的大遊行、2007 年展開的本土保育運動、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 年的雨傘運動（金鐘）。³⁰ 基本上，香港眾志在「民主自決」的旗幟下吸納了過去本土左翼所強調的若干元素（反地產霸權）與抗爭經驗（本土保育運動），而「民主自決」也將本土左翼整合進入香港前途問題（涉及香港政治共同體的想像）（何明修 2016），當然強調民主的群眾參與與非暴力抗爭都與本土右翼的劃定身分邊界的民族主義和勇武行動進行了區隔。儘管如此，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雖然香港眾志和熱普城屬於不同類型，但是，香港

27 DEMOSISTO 是由希臘文「Demos」和拉丁文「Sistō」所組成，前者是「人民」之意（democracy 亦由此而來），後者指「站起來」，與其它英文字「insist」（堅持）、「persis」（堅毅）、「resist」（堅持）亦有所關聯。

28 香港眾志可以說是雨傘運動金鐘大台領導階層的延續，佔中三子中的陳健民教授也投入推動了此一政黨的出現。一位受訪者說：「眾志給我的感覺就是要延續雙學那種感覺，並不覺得是新的東西」（訪談編號 HK160205）。

29 可參閱香港眾志的官網連結（<https://www.demosisto.hk/>）。

30 這條抗爭系譜的追溯「反基本法、保育土地運動、反國教、雨傘運動」，可以說具體體現了自決派的論述框架，如果是由本土派來描述此一抗爭系譜則會變為「反蝗蟲、反新移民、光復行動、雨傘運動（旺角佔領區）、旺角騷亂」，其中的雨傘運動，自決派追溯的是金鐘佔領區，而本土派追溯的是旺角佔領區，佔領的空間反映了兩者的分歧和內部的整合。

眾志的《香港約章》和「公投制憲」（黃毓民）、「永續基本法」（陳雲）卻有著相近性，一個共通原則就是中國應該與香港人民重新制定政治契約（香港人民有權參與），從這點來看反而凸顯了熱普城與本民前的政治距離。

正是這樣的立場，在選舉階段香港眾志的羅冠聰與長期投身土地保育運動的朱凱迪和社區基層勞工議題的劉小麗進行了結盟（聯合競選），形成了所謂「民主自決派」，他們在 2016 年 7 月 30 日發表了共同的政治綱領，具體描繪了民主自決派的論述框架，其要點為：「我們的共同政治綱領是『民主自決』。民主自決的政治意義本就是要超越所有對人民的限制，包括是《基本法》的限制，以民主的方式讓人民決定自身的命運和香港前途。30 多年前，港人無權參與中英談判，《基本法》亦非經過人民授權的產物。2016 年，我們必須重拾對於制度改革的話語權，主張人民才是處理自身問題的惟一主人，堅信『主權在民』之原則。人民，從來是一切政權權力的最終擁有者，政權、憲法的一切權力應是來自人民的授予，公權力應為人民服務，並極力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主的自由。可惜到了今天，政權和基本法均成為了肆意打壓、限制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工具。若政府繼續倒行逆施，違反所謂與人民簽訂的契約，人民絕對有權回收公權力，由人民重新決定我們的政體」。³¹ 延續了香港眾志的基調，強調香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可以打破基本法的框架與中國重訂政治契約，其後三人都順利成為立法會議員讓此一聯盟愈形鞏固。不過，本土派認為民主自決的立場十分空洞：「我覺得講民主自決的那群人是有点投機，談自決的那批人迴避了提出自己立場的責任。你談民主，你首先要談身分嘛！民主就要界定身分嘛！」（訪談編號 HK160204）「在選舉他們談民主自決，自決之後是怎樣的方向，全港公投回到中國這樣可以嗎？他們實際上沒有表達一個真正自己的立場」（訪談編號 HK160206）。「他們就是欺騙香港人，作為政黨應

31 此一政治綱領全文參見 <https://www.demosisto.hk/article/details/72>。

該有一個立場，但是他們沒有提供方向」（訪談編號 HK170101）。不過，一位自決派成員回擊了這樣的批評：「本土派會談主權問題，他們都主張香港獨立，但是我們覺得香港獨立這是一個 option，不是一個 must」（訪談編號 HK190103）。所以，他們強調的是民主運動過程中，每個人都有機會和能力去思考香港問題，以自決的方式來改變。

除了民主自決派本身的聯盟，在傳統泛民政黨中，以梁國雄（長毛）為核心的「社會民主連線」（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以下簡稱「社民連」）與自決派也有著密切的合作。相較於民主黨、公民黨這些具中產菁英色彩的政黨，社民連以泛民的左派（托派）基層政黨自居，在中港關係上強調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官網首頁的標題寫著「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濟弱扶傾 義無反顧」，依照創黨成員的解釋：「『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其實我就說你們〔指傳統泛民〕就沒有抗爭，怎麼有改變。『濟弱扶傾，義無反顧』。那就是左派的政治，不過是用中國的話說出來」（訪談編號 HK190101）。不過，抗爭行動上不贊成本土派的勇武抗爭，而是強調公民抗命的非暴力手段但不排斥必要的肢體接觸，左翼的理念與抗爭策略可以說與自決派有著親近性，提供了彼此的合作空間。「簡單來說，大家都是行動派啊！公民黨他們那些律師不願意被抓啊！但是社民連他們就願意啊！就是這樣而已」（訪談編號 HK190103）。此外，社民連曾在 2011 年發生分裂，創黨主席黃毓民率領 200 多名黨員退黨另外成立「人民力量」（People Power），試圖採取更激進的策略（癱瘓議事或佔領活動）迫使政府進行政治改革，也藉此來與傳統泛民派加以區隔，在當時引起了諸多爭議，也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文化。他在 2013 年退出人民力量轉而支持逐漸興起的本土派社團，對本土派的政治發展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對支持者而言，黃毓民是一位具有魅力的「領袖」，是改變議會政治文化的要角；但對反對者而言，他是個政客，是個投機分子。社民連的一位核心幹部提到：「他從社民連分割出去的時候，就是跟

長毛說了一句話，長毛告訴我的，他說長毛啊，現在講的是本土啊！他看到這個大勢，香港有這個形勢……有一些政客會利用這個所謂本土思潮的熱潮，然後去形成他們的政治勢力，我就直說就是黃毓民。黃毓民在我剛入社民連的時候，在一個節目上，有一個記者問他，黃毓民你愛國嗎？他說我愛得不得了。但是現在他說什麼，他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訪談編號 HK180103）。從這位訪談者的觀察角度，本土派的許多作為和主張「就是因為選票，這就是要跟其它政治立場分歧的原因……黃毓民那邊就是利益的本土派」（訪談編號 HK180103）。從上述的分析中，一方面讓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泛民派與自決派不同類型之間的過渡性與流動性，另一方面，社民連的分裂也讓我們具體看到本土派與泛民派在理念與利益（選票）之間所顯現出的類型分歧。事實上，社民連也多次跟年輕的本土世代有所衝突，一位曾有相關經歷的受訪者就提到：「整個本土派很討厭社民連那些左膠，社民連現在也會反擊，雙方衝突很大。我認為社民連一定要結束，這不是攻擊，而是他們道德有問題，他們會做很多小手段，譬如說陳雲發表本土理論，他們發信去嶺大，跟學校說他是法西斯要開除他」（訪談編號 HK160206）。

表 2 是筆者就目前的觀察對「民主回歸論／新本土論述（自決派／本土派）」進行三種類型的建構和對比。整體來看，不同的本土意識通過不同的抗爭系譜來建構自身的論述框架。民主回歸論是以每年的七一遊行和六四維園紀念晚會為抗爭主軸，左翼的民主自決沿著「天星皇后碼頭反拆遷、菜園村、反高鐵、反新界東北開發、反國教、雨傘運動（金鐘）」這樣的軸線，而右翼的民族自決則是沿著「反蝗蟲（反雙非、反新移民）、光復行動（反水貨客）、雨傘革命（旺角）、旺角革命」這條軸線。此外，彼此之間還有一系列的修辭鬥爭「雨傘運動 vs. 雨傘革命」、「回歸現實 vs. 離地賣港」、「愛與和平 vs. 勇武抗爭」。彼此之間還不斷地相互指控和汙名化，本土派指控泛民是離地賣港、左翼人士是左膠、大中華膠，反過來本土派則被指控為排外法西斯，甚至於是「鬼」（指被中共收買來破壞香

港民主運動的人)。這樣的相互指責乃至於互不信任在訪談中是很明顯的，一位本土派的受訪者說：「泛民跟社運界跟政府或者是跟財團有合作，在關鍵時候他們會解散群眾，下次議題來，他又會再來，但是行動永遠不會升級」（訪談編號 HK150104）。另一位支持泛民的社運人士說：「現在我們說的本土派多少是指一、兩個特定的組織，他們有特定的目的，我蠻相信那些標榜本土派的是背後有中國支持」（訪談編號 HK160202）。我們也可以從多重本土論述的角度來重新理解雨傘運動背後的性質，可以說這是在同一把傘下所進行的複數政治動員。雨傘運動（革命）除了打破香港長期由泛民主導的抗爭傳統（七一遊行、六四晚會），其中還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雨傘運動抗爭者分布在不同的城市空間，包括了金鐘、旺角、銅鑼灣等等。除了對北京政府這個共同敵人進行抗爭之外，事實上，新本土論述也利用了不同的空間對自己的論述框架、行動策略進行展演、形塑不同的集體認同（Yuen 2018: 402-404），³² 在金鐘佔領區由雙學領導的公民抗命，本土派則在旺角佔領區上演勇武抗爭。「本土派跟傳統泛民（含自決派）那一個裂痕，其實雨傘之前已經有，但是雨傘是一個爆發點」（訪談編號 HK170102），在同一場抗爭運動中，反而更為確認了彼此之間的分歧與差異，乃至於在抗爭場合中累積了對彼此的叫囂與不滿，一場無法取得明確成果的運動帶給公民社會許多的無奈與創傷（林怡廷 2016: 94-95），對於運動「失敗」的檢討似乎讓雙方更行更遠。這種對立性的失敗檢討很明顯的表現在《雨傘政治四重奏》和《雨傘失敗錄》兩本相互對立的著作中，陳景輝在《雨傘政治四重奏》一書為文批判了那些將運動妄稱「革命」、試圖運用暴力、隨意發動失法抗爭的「右膠」，這場運動讓他親身經歷了本土右派的反民主性質（陳景輝 2015: 10, 33-34）。在熱血公民所出版的《雨傘失敗錄》則是詳細彙整運動過程中飯民（泛民）、左膠、佔中三子扯後腿

32 在空間分佈上，金鐘位在港島鄰近中環象徵著高端資本主義商業區，而旺角則是一個老舊密集壅擠的商業住宅區，傳統上旺角象徵著一種草根、底層文化，是本地年輕人和工人階級的聚集地。對照於台北市地理分佈，大致可類比為東區和萬華。

的行為，他們聲稱這是一本「飯民左膠惡行錄」，強調「佔領中環從未發生」，並為抗爭行動正名為「雨傘革命」（熱血時報 2016: 14-15）。在這場香港歷史性的抗爭中，彼此卻活在不同的認知世界。³³

表 2 三種香港本土意識的類型圖示

	民主回歸論	新本土論述	
		自決派	本土派
主要行動者、團體	支聯會、傳統泛民政黨（民主黨、公民黨等） ³⁴	香港眾志、朱凱迪、小麗民主教室	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城邦派）
在地抗爭的系譜	七一遊行、六四維園紀念晚會	天星皇后碼頭反拆遷、反高鐵、反新界東北開發、反國教、雨傘運動（金鐘）	反蝗蟲（反雙非、反新移民）、光復行動（反水貨客）、雨傘革命（旺角）、魚蛋革命
論述劇碼	民主回歸論	開放本土、解殖論、民主自決	城邦論、民族論、民族自決
抗爭模式（劇碼、策略） ³⁵	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³⁶	公民抗命（非暴力抗爭、有限度的肢體衝突）	勇武抗爭（抗爭無底線）
重要主張	建設民主中國	2047 香港二次前途問題	港獨、永續基本法
主要動員方式	七一遊行、六四維園紀念晚會	公民運動與社區培力	族群動員
對紀念六四的立場	紀念六四	本土六四	反對紀念六四
汙名化修辭（對手指控）	離地泛民、左膠、港	大中華膠、離地賣港	排外法西斯、民粹主義、鬼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33 審查人認為本土派（特別是熱普城）提出的「勇武抗爭」來批判泛民主派的「和理非非」往往只是動動嘴巴（lip service）沒有實際行動，最終結果只是被懷疑來破壞民主運動，並且認為作者在本文中也是採用了本土派這樣的批判觀點。審查人對熱普城的質疑也是許多泛民主派人士的質疑，主要論點就是懷疑許多本土派的人是「鬼」（收了共產黨的錢來破壞民主運動）。筆者對此有兩點回應：第一，關於本土派提出勇武抗爭的「動機」。筆者作為一個台灣的研究者，無意也無法調查這些人是不是「鬼」。在研究上，筆者也有將審查人所說的現象提出來，並且，筆者也論證了本土派在發展上的異質性（例如：熱普城本身內部的差異、熱普城與本民前的差別）。第二，關於

五、結語

本文試圖以中國因素「作用力／反作用力」的架構來說明近年香港本土意識的生成與發展，香港經驗的特殊性與複雜之處在於不同的抗爭系譜形塑了三種不同的本土意識類型（民主回歸／民主自決／民族自決），以及相應的三種抗爭模式（和理非非／公民抗命／勇武抗爭）。在不同的本土意識類型下，不同的陣營擁有著不同的支持群眾，以不同的論述與認知框架、抗爭策略來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進行回應。然而，在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形成愈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中，更容易讓不同的行動者和團體在理念與行動上相互仇視和指責，此種對立的社會關係與情感利益的糾葛，都將更進一步促進與鞏固香港本土意識在發展上的分歧與碎裂化。不同的立場沿著自身的抗爭系譜建構著自己的認知與論述框架，彼此之間進行著理念與利益的競逐，採取著不同的抗爭模式，香港如何在分歧中尋找一種團結香港的方式將是一

本土派提出勇武抗爭的「效果」。從 Quentin Skinner 的觀點來看，語言同樣能夠作為一種行動（The pen is a mighty sword）。因此，相關論述所產生的社會作用才是筆者關懷的重點。此外，筆者更想要強調的是這些本土派的論述對於香港年輕世代確實產生了作用與影響，我們從這幾個月所發生的反送中的勇武抗爭已經清楚證明了筆者的論點。

- 34 公民黨（Civic Party）成立於 2006 年算是泛民陣營的新興政黨，雖未參與過 1980 年代民主回歸論的討論，但是，它在創黨宣言中其中一個主軸即是強調在一國兩制下落實港人的民主自治並建設民主中國等論點（<https://www.civicparty.hk/?q=node/3>）。
- 35 審查人不認同筆者將泛民政黨在雨傘運動中的抗爭劇碼和策略只是歸類為「和理非非」而不是「公民抗命」，不過，表 2 所呈現的三種本土意識類型或抗爭模式並不是僅針對雨傘運動所建構的，筆者是在凸顯每一種類型在香港長期民主運動過程中的典型樣態。即使從雨傘運動來看，佔中三子可以算是支持泛民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們所提出的是「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精確來說，他們只是想以發動佔中這件事給特區政府壓力，但並未試圖真正實踐這件事，是在後來的政治形勢下，雙學這年輕世代才真正引發了公民抗命的雨傘運動。此外，筆者在文章中也已顧及到泛民政黨之間的異質性，特別有去討論了社民連此種抗爭型政黨對公民抗命的抗爭模式就有長期的認同。
- 36 和理非非的抗爭模式有如下的特點：（1）以溝通談判來與北京交往；（2）以選票、議會議政為中心的民主觀；（3）儀式性的抗議；（4）利益代理人的社運策略；（5）以中產紳士式理性辯論為本的政治文化；（6）民運領袖以社會怨氣疏導者自居；（7）除普選議題，欠缺與建制派不同的社會文化藍圖（羅永生 2018: 23-24）。基本上，公民抗命與勇武抗爭都可以說是對此一傳統抗爭模式的挑戰。

個必須被嚴肅面對的課題。³⁷

回顧 2016 年選舉前後的情勢，挾補選時高支持度光環的本民前梁天琦在選舉前以資格不符為由被褫奪了參選資格（Disqualification, DQ），而當選的幾位非傳統泛民候選人當中，青年新政的兩位當選人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宣誓就任時，前者在誓詞中加入「支那」的字眼，後者身披「Hong Kong is not China」標語的布條，皆被認為宣誓無效，幾經波折，最後仍被北京人大釋法判定失去議員資格。同樣地，民主自決派的三位議員（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以及社民連的梁國雄（長毛）也都因為若干宣誓瑕疵，被梁振英政府提出無效之訴，幾經司法訴訟最終仍被認定宣誓無效喪失議員資格。³⁸ 除了參選權和參政權的剝奪，香港政府更開始針對過往的社會抗爭活動進行一系列的法律控訴，眾多知名的社會運動人士和不知名的參與者紛紛成為「政治犯」。³⁹ 2017 年是香港移交中國的二十周年，但是，在雨傘運動的挫折之後，面對政府當局有限民主體制內的選舉過程或結果竟被政府透過 DQ 手段荒謬的操控，更不用說在中國因素陰影下所發生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大學校園自主屢遭剝奪、高鐵九龍西站的一地兩檢，再加上許多未必有利於民生的土地開發或公共工程，這些事件帶給香港公民社會更強烈的悲憤和無力感。無論是左翼或右翼、民主或民族自決，他們的主張使他們不僅無法參選，更有被捕入獄之虞，而在面對中國的威權統治，香港人追求民主和民族自

37 對照台灣經驗，王甫昌（1996）曾試圖解釋 1980 年代中葉以後為何反對運動取得愈來愈大的成功，特別是在 1992 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一舉突破了 3 成的選票並贏得首度改選後三分之一的立委席次。相較於 1970 年代反對運動對國民黨的挑戰，1980 年代之後更為成功的關鍵在於有效的「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解嚴之後讓民進黨可以以較完整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去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筆者認為，共識動員促進了反對運動的選舉成果，反過來一個民主的選舉體制才會有利於共識動員的形成。

38 在 2018 年進行立法會議員補選，參選人中周庭（代表眾志）、陳國強、劉穎匡等三人被認定資格不符取消參選資格。其後劉小麗再度欲參選九龍西補選，選舉主任因其過去主張自決再次被認定不符參選資格。

39 這些事件包括了雨傘運動期間被控非法集會的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三人；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13 名抗爭者衝擊立法會被控非法集結罪成立；旺角衝突中多人被控暴動與襲警罪，其中本民前核心人物梁天琦判刑 6 年，黃台仰等人則在宣判前離開香港流亡海外。

決的前景似乎顯得一片黯淡。

總體來看，不同於台灣 1990 年代的民族建構（新台灣人）可以依附於中華民國而轉變為一個「新國家」（若林正丈 2014: 232；鄭祖邦 2011），在政治結構上香港缺乏國家條件（stateness）（吳介民 2012: 128；Linz and Stepan 1996: 16），這就使得民族的想像難以具備真實的依託，在一國兩制的特殊體制下，「香港獨立」難以取得廣泛群眾的支持，反而很容易被視作是不可行的政治方案或政治幻想，理想性大於現實性，而僅剩的有限民主體制更淪為被政治操控的選舉機制。這些不利的條件在在使得香港在政治權力的運作上難以產生具制衡能力並領導群眾的政黨。在台灣和香港的自主命運發展過程中，似乎都存在著一種由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力量而引發的命定論（吳介民、廖美 2016）。英國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 Perry Anderson 在 2004 年台灣總統大選訪台之後寫下了〈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Blue and Green in South China Sea）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了對台灣長期命運的看法：「無論短期結果如何，長遠看，中國接受台灣分裂的機會很小。從國族國家的立場來說，一個與主要人口並無族裔區別的原有省份要尋求獨立，那就是分離主義。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族國家許可過這種事。更何況，國際間存在著事實上的共識，反對承認這種分裂。……歷史地看，某種形式的重新結合，將是長遠進程中最有可能的結局」（Anderson 2004: 241-242）。同樣地，美國著名的民主理論研究者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斷言了香港的一個結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變成一個民主政體，無論那裏的民主運動範圍和力量有多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出於自身的考慮，特別是為了和澳門，尤其是和台灣實現統一的計畫，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自主性和自治地位，但是這個決定權最終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Linz and Stepan 1996: 18）。這樣的論點不禁讓人回想《十年》影片中對一國兩制破產的預示，或許這是連 Linz 和 Stepan 當初都預想不到的

悲觀場景。

上述這種激進結構論的現實主義視角，的確有許多令人參照與省思之處，但未必能具體地關照到台港兩地在地抗爭中所展現的能动性，並以本土意識的建立和民主價值的追求試圖突破此種強權式的地緣政治格局。本文探討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歧與整合，就整體趨勢而言，2003 至 2016 年反對運動內部的分歧高於整合，並且，在雨傘運動過後，除了真普選的落空，香港更是面臨了一連串民主化持續倒退的情形。然而，就在一片無奈甚至絕望的氣氛中，從 2019 年 6 月開始香港爆發了舉世矚目的反送中抗爭運動，抗爭者以「無大台」的形式來作為一種團結與整合香港民主運動的方式。從筆者角度來看，這場沒有大台、沒有特定領袖、去中心化的社會抗爭運動，正是與分歧的抗爭模式以及 2014 年雨傘運動過後香港陷入的反對運動困境有所關聯（鄭祖邦 2019），而從本文的分析正可以對此種無大台的運動狀態進行一定程度的解釋。在當前無論何種抗爭模式（「和理非非」、「公民抗命」和「勇武抗爭」）都爆發了驚人的能量，不同陣營也放下分歧形塑了前所未有的團結一致感，似乎香港的反對運動正在尋求一種團結與整合的可能性，香港的本土意識及其抗爭模式是否會有一種辯證性的超越達成進一步的整合？這將是值得我們未來持續觀察的重點。

誌謝：本文是科技部計畫的部分成果（計畫名稱：「香港本土論述的辯證：中國因素下在地抗爭的分歧與整合」，MOST106-2410-H-431-014-MY2），感謝科技部的經費支持。本文能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編委會提供給我許多寶貴的建議，指出許多個人在論證上的不足與缺失之處讓筆者得以反思與修改，當然一切文責由作者負責。此外，還要感謝每一位曾經接受我深度訪談的朋友，無論你們彼此之間所採取的行動立場有多麼的不同，但是，各位在極艱難的條件下為香港民主運動毅力前行的精神都令我感佩於心。在研究過程中，還得到許多香港在地朋友的支援和協助，Ray、Jackson、Samson、Jacky、Huang。最後，魏龍達、顏家珊、陳臻三位在相關行政與研究事務上的協助也深表謝意。

附錄 訪談記錄一覽表

訪談編號	受訪者身分	訪談日期
HK150102	《學苑》前主編	2015/11/16
HK150104	前嶺南大學教授	2015/11/16
HK160202	社運與政黨人士	2016/08/14
HK160204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	2016/08/15
HK160205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	2016/08/16
HK160206	《學苑》前主編	2016/08/16
HK160207	前學聯秘書長、民陣召集人	2016/08/16
HK170101	城大月報前主編	2017/07/12
HK170102	本民前核心成員	2017/07/13
HK170105	青年新政核心成員	2017/07/15
HK180101	香港民族黨核心成員	2018/06/02
HK180103	社民連核心成員	2018/06/04
HK180104	左翼社運人士	2018/06/05
HK190101	社民連創黨成員	2019/04/27
HK190103	學民思潮、香港眾志核心成員	2019/04/30
HK190106	熱血公民核心成員	2019/04/30

註：訪談地點均為香港

參考文獻

-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 129-209。
- 王俊杰，2014，〈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頁 33-49，收錄於香港大學學苑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 王耀宗、陳冠匡，2017，〈從台灣獨立運動看香港本土主義的走向〉。頁 189-216，收錄於鄭宇碩編，《探討本土主義》。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方志恆，2017，〈香港的本土化浪潮：中國因素氣旋下的抵抗動員〉。《中國大陸研究》60(1): 1-17。
- 孔誥烽，2011，〈從維港發現玉山——港台本土意識的共振〉。頁 115-122，收錄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路編，《本土論述 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台北：漫遊者文化。
- ，2014，《少年香港：天朝帝國下本土主體的成長》。香港：圓桌菁英。
- 李祖喬，2018，〈勇武抗爭：香港的知識分子與暴力／武力的觀念〉。頁 207-221，收錄於鄭煒、袁瑋熙編，《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李啟迪，2014，〈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頁 63-76，收錄於香港大學學苑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文化。
- ，2014a，〈港台的抵抗運動為何呈現趨同性？〉。《文化研究》18: 170-177。
- ，2014b，〈「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公民抵抗運動〉。頁 130-144，收錄於謝政諭、高橋伸夫、黃英哲編，《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台北：前衛。
- ，2017，〈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頁 21-85，收錄於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台北：左岸文化。
- 吳介民、廖美，2015，〈從統獨到中國因素：政治認同變動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台灣社會學》29: 89-132。
- ，2016，〈佔領，打破命定論〉。頁 115-161，收錄於林秀幸、吳叡人編，《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台北：左岸文化。
- 何明修，2016，〈當社會運動前進議會 香港給台灣的啟示〉，報導者 The Reporter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hongkong-legislative-council->

- election，取用日期：2016 年 10 月 14 日）。
- ，2017，〈第三勢力與傘兵：比較台港佔領運動後的選舉參與〉。《中國大陸研究》60(1): 59-86。
- 呂大樂，1997，〈香港故事——「香港意識」的歷史發展〉。頁 1-16，收錄於高承恕、陳介玄編，《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台北：聯經。
- 林怡廷，2016，〈旺角少年，不被理解的戰鬥〉。頁 87-96，收錄於張潔平、鍾耀華編，《香港三年》。香港：牛津大學。
- 林緻茵，2015，〈中國因素：愛國論與香港的政治文化論〉。頁 99-113，收錄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路編，《本土論述 2013-2014 中國因素：本土意識與公民社會》。台北：漫遊者文化。
- 若林正丈，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馬嶽，2012，《香港 80 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徐承恩，2017，《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台北：左岸文化。
- 陳允中，2013，〈開放派與土著派的本土想像〉。《蘋果日報》（香港）（<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529/18275711>，取用日期：2016 年 11 月 18 日）。
- ，2014，〈香港的土地正義運動：保衛家園與保衛國族是不相容的〉，《文化研究》18: 188-199。
- 陳雲，2011，《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
- ，2012，〈香港城邦與港人自治論〉。頁 179-203，收錄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路編，《本土論述 2011：想像新界／本土的性與別》。台北：漫遊者文化。
- ，2013，《香港遺民論》。香港：次文化堂。
- ，2014，《香港城邦論 II：光復本土》。香港：天窗。
- ，2015，《左膠禍港錄——香港政治困局大解謎》。香港：花千樹。
- 陳奕廷，2015，《傘裡傘外：民主前夕的香港故事》。台北：水牛文化。
-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
- 陳建民、吳木欣，2017，〈本土、勇武與犬儒：傘後香港的社會趨勢〉。《中國大陸研究》60(1): 19-36。
- 陳景輝，2009，〈本土運動的緣起〉。頁 29-31，收錄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路編，《本土論述 2008》。台北：漫遊者文化。
- ，2013，《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社會》。香港：圓桌文化。

- ，2014，〈論香港本土的左與右，兼初步勾勒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構想〉。《香港獨立媒體網》，1月7日（<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20041>，取用日期：2018年8月12日）。
- ，2015，〈歡迎來臨雨傘荒漠〉。頁1-40，收錄於Anthony、小小、何式凝、陳景輝編，《雨傘政治四重奏》。香港：進一步。
- 陳雅明，2015，〈香港人意識：雨傘世代的命運自主意志〉。頁24-27，收錄於香港大學學苑編輯委員會編，《雨傘世代 自決未來》（1月號）。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 許寶強，2015，〈「愛」的政治〉。頁93-97，收錄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路編，《本土論述 2013-2014 中國因素：本土意識與公民社會》。台北：漫遊者文化。
- 梁一夢，2018，〈「面對共同敵人，和解好嗎？」——談香港民主運動的「敗局困境」〉，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117-opinion-prisoner-dilemma/>，取用日期：2018年1月18日）。
- 梁啟智，2009，〈城市發展與本土論述〉。頁22-28，收錄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路編，《本土論述 2008》。台北：漫遊者文化。
- 梁繼平，2014，〈序一〉。頁7-12，收錄於香港大學學苑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 ，2015，〈民族、民主、雨傘革命〉。頁28-31，收錄於香港大學學苑編輯委員會，《雨傘世代 自決未來》（1月號）。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 黃洪，2014，〈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回應「民主回歸派」落幕的說法〉。《明報》（https://web.swk.cuhk.edu.hk/~hwong/pubfile/newspaper/pubnp_20140912.pdf，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7日）。
- 黃毓民，2016，《公投制憲 香港維新》。香港：普羅政治學苑。
- 曾澍基，1982，〈改造現狀的考慮——考慮範圍的改造〉。頁1-3，收錄於香港前途研究小組編，《五星旗下的香港——香港前途問題探討》。香港：曙光。
- 葉蔭聰、易汶健，2014，〈本土右翼與經濟右翼：由香港網路上一宗爭議說起〉。《思想》26: 153-168。
- 葉寶琳，2016，〈一串魚蛋所凸顯的空間霸權〉，香港01博評（<http://www.hk01.com/01博評-香港地/7129/葉寶琳-一串魚蛋所突顯的空間霸權>，取用日期：2016年3月18日）。
- 蔡子強，2014，〈路走到這裏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140904/s00012/1409766675347/路走到這裏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文-蔡子強>，取用日期：2015年10月27日）。

- 鄭祖邦，2011，〈台灣新國家的難題與民主化：由施密特「決斷敵人」概念出發的考察〉。《社會分析》3: 83-117。
- ，2015，〈中國因素與香港新本土論述的開展〉。《台灣社會學會通訊》83: 25-29。
- ，2019，〈從反送中運動到時代革命：沒有抗爭大台意味著什麼？〉，巷仔口社會學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9/08/27/chengtsubang/>，取用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 熱血時報，2016，《雨傘失敗錄》。香港：熱血時報。
-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鄭健銘、何俊霆，2015，〈論香港「自治共同體」——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頁 33-51，收錄於方志恆編，《香港革新論》。台北：漫遊者文化。
- 羅永生，2013，〈（覺醒：台灣、香港的公民力量之戀殖篇）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台灣新社會智庫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 政策報告 / 兩岸國際 / 5660-（覺醒：台灣、香港的公民力量之戀殖篇）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取用日期：2013 年 12 月 18 日)。
- ，2018，〈身份政治往何處去？〉。頁 19-36，收錄於鄭煒、袁瑋熙編，《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Anderson, Perry 著、王超華譯，2004，〈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5: 225-242。
- Weber, Max 著、顧忠華譯，1993，《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台北：遠流。
- Bhattacharya, Abanti. 2005. "Chinese Nationalism Contested: The Rise of Hong Kong Identity." *Issues & Studies* 41(2): 37-74.
- Brewer, Marilyn B. 1999.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Identity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2): 187-197.
- Chan, Elaine. 2000. "Defining Fellow Compatriots as 'Others'—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5(4): 499-519.
- Chen, Yun-chung and Mirana M. Szeto. 2015. "The Forgotten Road of Progressive Localism: New Preservation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3): 436-453.
- Cheng, Edmund W. 2016. "Street Politics in a Hybrid Regime: The Diffusion of Political Activism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China Quarterly* 226: 383-406.
- Cheung, Peter T. Y. 2018. "In Beijing's Tightening Grip: Changing Mainland-Hong Kong Relations amid Integ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Pp. 255-286 in *Hong Kong 20*

-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Emerging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ractures After 1997*, edited by Brian C. H. Fong and Tai-Lok Lui.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hun, Allen. 1996.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the Changing Spaces of Public Culture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3(1): 51-75.
- Cooper, Luke. 2018. "'You Have to Fight on Your Own': Self- Alienation and the New Hong Kong Nationalism." Pp.94-113 in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New Hong Kong: Localism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edited by Wai-man Lam and Luke Cooper. New York: Routledge.
- Fong, Brian C. H. 2013. "State-Society Conflicts under Hong Kong's Hybrid Regime: Governing Coalition Building and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Asian Survey* 53(5): 854-882.
- .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43(5): 523-556.
- Fung, Anthony. 2010. "What Makes the Local?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Cultural Studies* 15(3-4): 591-601.
- Ho, Ming-Sho. 2019.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Ip, Iam-chong. 2015. "Politics of Belonging: A Study of the Campaign against Mainland Visitors in Hong Ko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3): 410-421.
- Kaeding, Malte Philipp. 2017. "The Rise of 'Localis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8(1): 157-171.
- Ku, Agnes Shuk-Mei. 2012. "Remaking Places and Fashioning an Opposition Discourse: Struggle over the Star Ferry Pier and the Queen's Pier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 &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0(1): 5-22.
- Kwong, Ying-ho. 2016a. "The Growth of 'Localism'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s* 3: 63-68.
- . 2016b. "State-Society Conflict Radicalization in Hong Kong: The Rise of 'Anti-China' Sentiment and Radical Localism." *Asian Affairs* 47(3): 428-442.
- Lam, Wai-man. 2018. "Hong Kong's Fragmented Soul: Exploring Brands of Localism." Pp. 72-93 in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New Hong Kong: Localism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edited by Wai-man Lam and Luke Cooper. New York: Routledge.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 Eric K. W. 2007. "Grassroots Nationalism: Changing Identity in a Changing Context." *The China Review* 7(2): 149-167.
- Ma, Ngok. 2005. "Civil Society in Self-Defense: The Struggle against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44): 465-482.
- . 2011.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 *Asian Survey* 51(4): 683-712.
- . 2012.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 Pp. 159-178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edited by Wai-man Lam, Percy Luen-Tim Lui, and Wilson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 2017. "The China Factor in Hong Kong Elections: 1991 to 2016." *China Perspectives* 3: 17-26.
- Mathews, Gordon, Eric Kit-wai Ma, and Tai-lok Lui. 2008.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Ortmann, Stephan. 2018.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dentity: From Local to National Identity." Pp. 114-131 in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New Hong Kong: Localism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edited by Wai-man Lam and Luke Cooper. New York: Routledge.
- Snow, David A. 2007. "Framing Processes, Ideology, and Discursive Fields." Pp. 380-412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avid A.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So, Alvin Y. 2011.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Hong Kong-China National Integration: A Crisis-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1(1): 99-116.
- . 2016.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Nationalism." Pp. 135-146 in *Asian Nationalisms Reconsidered*, edited by Jeff Kingston. Oxford: Routledge.
- Steinberg, Marc W. 1998. "Tilting the Frame: Considerations on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from a Discursive Turn." *Theory and Society* 27(6): 845-872.
- Veg, Sebastian. 2017. "The Rise of 'Localism' and Civic Identity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230: 323-347.
-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7.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16 November (<https://www.>

- 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7).
- Wong, Yiu-chung. 2017. "Localism in Hong Kong: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2): 617-655.
- Wu, Rwei-ren. 2016. "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4): 686-705.
- Yew, Chiew-ping and Kin-ming Kwong. 2014. "Hong Kong Identity on the Rise." *Asian Survey* 54(6): 1088-1112.
- Yuen, Samson. 2014. "Under the Shadow of China: Beijing'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na Perspectives* 2: 69-76.
- . 2018. "Contesting Middle-Class Civility: Place-Base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ong Kong's Occupy Mongkok."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4): 393-407.